

書評：風雨兼程—— 安陽（衛輝）教區史

周萍萍

基督宗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傳入中國河南省則有四百多年的歷史。1628年，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si）神父經河南省會開封赴山西傳教，偶然的機緣他得以在開封傳教。史料載：「有天主教商人名伯多祿（Pierre）者，正憂其故鄉無教師，留方濟居開封，為租一小宅，租期三月。時有方濟舊在北京認識之官吏數人，在開封居高位，方濟賴其介紹，聲望遂起，新教所遂以成立，在開封傳教數年。第一受洗人即此商人之弟，教名保祿（Paul）。」¹

河南開教後，信徒人數一直不多，因此天主教在河南的傳播局面並沒有打開。再加上清朝康熙年間爆發的「禮儀之爭」，羅馬教廷不准中國教士、教民「祭祖」、「敬孔」，認為是異端；康熙皇帝遂在教廷禁約上硃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²這對中國天主教會的生存和發展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因羅馬教廷不准中國信徒祭祖，使一些教民背教；不許敬孔，又使信教文人不能應科舉取仕，文人士紳逐漸與教會疏遠，而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則拉開了中國百年禁教的序幕，因此禁教期河南境內只有零星的信徒。

1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44。

2 陳垣編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1932）。

鴉片戰爭後，西方殖民國家要求中國馳禁天主教。1844年，羅馬教廷把河南省劃為一個獨立的代牧區，脫離南京教區，任命安若望·巴都 (Jean Henri Baldus) 為河南代牧區首任主教。1869年，教廷把河南教務轉給米蘭外方傳教會 (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1873年，正式成立河南南部教區——南陽教區，1882年，成立北部教區——衛輝教區。

衛輝教區自1882年成立以來，主教座堂先設在林縣田家井，後來遷至小莊，後再遷至衛輝，1924年正式稱為衛輝教區。1953年，主教府遷到安陽，所以衛輝教區也稱安陽教區。在當代社會，衛輝教區在信徒人數和神父人數上堪為河南省第一大教區，其信徒人數占全省信徒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七，神父人數占全省神父總數的百分之十八點二。

正因為安陽（衛輝）教區在河南省乃至全國天主教傳播史上的獨特地位，因此對其歷史發展脈絡的爬梳整理與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河南安陽師範學院劉志慶教授有志于此，歷時十數年，完成書稿《安陽（衛輝）教區史》，並於2008年2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付梓出版。此書無疑為學界、宗教界以及對此方面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了瞭解安陽（衛輝）教區的極好途徑。

該書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安陽（衛輝）教區簡史，第二部分是衛輝教區聖若瑟修女會研究，第三部分是安陽（衛輝）教區大事記，系統地記載了安陽（衛輝）教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的歷史。正如安陽教區張懷信主教所言：「安陽（衛輝）教區是近代意大利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在大陸創辦的四個教區（南陽、開封、衛輝、漢中）之一，雖非教友眾多、經濟實力雄厚的大教區，卻也素以歷史悠久、信德堅固、團結和睦而著稱。到今年（2006年——引者注）為止，教區已經走過了一百二十五年的風雨之路，教區修會——聖若瑟修女會也歷經了八十七個寒暑。百多年間，教

區雖歷經無數挫折磨難卻並未對福傳失去信心，我們失去的只是人性的懦弱與淺薄，留下的卻是對耶穌基督的無限虔誠與敬仰。」³

正是安陽（衛輝）教區在歷史上經歷的風風雨雨，導致教區資料所剩無幾，本就不多的書面資料和碑碣、圖片資料等在歷史變遷中損失殆盡，因此給系統研究帶來困難。劉志慶教授作為有心人，他花費了大量時間，把看到、聽到以及從多種場合得到的有關教區的資料都記載了下來，因此本書資料豐富、史料翔實是一個鮮明的特點。作者所用資料主要來源於：一是教區所轄各市縣區的地方誌資料以及個別縣市編纂成冊的文史資料；二是政府宗教管理部門、檔案部門保存的有關教區史方面的資料；三是作者十數年間積累的實地調查資料，其中包括作者採訪主教、神父、修女和信徒的記錄，以及一些信徒在文革期間保存下來的手寫稿或者後來的回憶錄等；四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教區重要活動的錄像資料；五是從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香港教區以及部分從梵蒂岡檔案館複印的資料。對此，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教授作了如下評論：「劉教授雖然不是教徒，但卻有著學者的探究精神與文化素養，抱著開放、謙虛而客觀的態度，嘗試巨細無遺地收集相關文獻，並又聆聽多種口述資料，再加以細心整理。」⁴

本書的另一特點是作者在書中所持觀點比較客觀、公正，對天主教在華引發的教案以及創辦的慈善事業都有論述。作者自述：「這本書中有為教會作的辯解，也有一些批評，我只是想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和立場，還歷史本來的面目，我無意去批評社會，更無意去詆毀教會，倘有一些觀點需要

3 劉志慶，《安陽（衛輝）教區史》（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8），多默主教序。

4 劉志慶，《安陽（衛輝）教區史》（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8），賴品超序。

負責任的話，我無可推辭也不會推辭，我願承擔全部責任！我認為，倘若世間多一份寬容與理解就會多一份愛，社會也就會越來越和諧、越來越美好。」⁵

眾所周知，西方教會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光彩的一頁。鴉片戰爭後，天主教再次入華是騎在帝國主義的洋槍洋炮上進入中國的。一些傳教士與母國的殖民勢力勾結在一起，他們常常橫行鄉里，買賣土地、包攬詞訟、魚肉百姓，同時因為教會勢力強大，也吸引了一批地方遊手好閒之人加入教會，他們仗恃教會勢力欺壓鄉鄰。教會的飛揚跋扈使當地群眾都有較強的反洋教心理和強烈的排外行為，因此民教衝突時有發生。而每一次教案的最終處理結果，都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強妥協以及眾多中國民眾向教會賠償更多的財物，這無疑更激起中國人的憤慨以及加深他們對教會勢力的敵視。劉志慶教授通過當時安陽一帶流行的順口溜，如「天主教瞎胡鬧，不打官司不信教，官司了了，教徒跑了」⁶等等，深刻而鮮明地揭露了當時教會勢力之龐大，以及一些信徒並不真心信主，只是把教會作為對自己有利工具的心態。

當然，天主教也把興辦慈善、教育事業等作為其重要的傳教手段之一，教會通過它們可以持久、廣泛、深入地接觸社會，以擴大影響。按天主教的傳統，各教區較大的教堂一般都設立孤兒院或育嬰堂，從事收養孤兒和棄嬰的活動。在收養孤兒和棄嬰的過程中，一方面對他們進行教義和神學的培養，力圖使他們成為教會中人；另一方面，也安排他們學一門手藝，做一些體力勞動。衛輝教區的司德望 (Stefano Scarella) 主教在林縣小莊、河北武安都建立了孤兒院，主教座堂遷到衛輝後，教區在衛輝設立了一座規模較大的孤兒

5 劉志慶，《安陽（衛輝）教區史》（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8），自序。

6 劉志慶，《安陽（衛輝）教區史》（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8），頁 100。

院。此外，在滑縣、安陽縣、浚縣等一些大堂口也設有孤兒院。教區辦孤兒院起初只是為了方便給垂死嬰兒付洗，後來主要是收容棄嬰，包括收容那些被丟棄的垂死的嬰兒。因為被送往孤兒院的兒童多半患有疾病或者嚴重營養不良，不少人進入孤兒院後不久就死去了，因此社會上流傳孤兒院裏對兒童「挖眼剖心」、「采生折割」。針對這些說法，劉志慶教授客觀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並指出：「死亡率較高這是孤兒院確實無法迴避的問題，但責任並不在教會。在孤兒院中能僥倖存活的棄嬰已實屬不易，其中也傾注了教會的諸多愛心。」⁷ 作者在書中還提及衛輝教區先後在較大的堂口如衛輝、安陽、武安、滑縣都開辦公教眼科醫院，在其他較小的堂口也都設有眼科診所。醫生和護士主要由意大利籍神父、聖心會修女和若瑟會修女擔任，既為信徒治病，也為社會大眾服務。

除開辦孤兒院、醫院診所等慈善機構外，天主教會還意識到教育在福傳工作中的重要性，傳教士們在中國積極創辦學校。數據表明：天主教在中國開設的學校，到 1914 年共有 8034 所，學生總數共有 132850 名，絕大部分為初等學校或教理學校。⁸ 至 1938 年，共有：「大學 3 所、學生 2738 名（內公教學生 469 名）、中小學 4249 所、學生 160999 名。」⁹ 安陽（衛輝）教區也很重視教育。1882 年，河南北部教區創立伊始，傳教士就在各個主要堂區創辦教會學校。他們先後在田家井、小莊、武安、汲縣、安陽、滑縣等堂口創辦教會學校，絕大部分小堂口都開辦了小學校。至 20 世紀初，在衛輝教區各個堂口先後都辦有教會中小學，招收信徒子女以及不信教家庭子

7 劉志慶，《安陽（衛輝）教區史》（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8），頁 150。

8 轉引自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379。

9 《益世報》（昆明），1939 年 2 月 19 日，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女人學學習文化，教授文化知識的同時也在課堂上宣傳福音。教會大力創辦學校，雖然其目的是讓更多中國人在教會學校中接受天主教教育，耳濡目染下歸信天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教育事業的前進，提高了國民素質。

由於各種原因，20世紀50年代之後，中國天主教會有一段時間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再加上檔案資料的稀缺，因此大陸治中國天主教史的學者對此階段研究往往語焉不詳，而劉志慶教授在書中對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天主教聖母軍、十字致命軍以及解放初期聖若瑟修女會的命運等都有介紹。需要指出的是，1978年後，國家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因此作者對從1980年開始，安陽市、鶴壁市所轄各市縣和新鄉市所轄的有關市縣根據國家的宗教政策，開始逐步落實、歸還安陽教區各堂口的房產，教區工作逐步得到恢復等都作了較詳盡敘述，特別提及聖若瑟修女會積極回應時代要求，為當地教內外群眾提供各項社會服務。

安陽（衛輝）教區雖然位於河南省一隅，但是其歷史也是天主教在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卓新平教授曾指出：中國基督宗教研究因其存在與發展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惟一性，使中國的基督宗教研究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意義，在世界基督宗教研究的學術論壇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¹⁰。因此儘管在學界和宗教界都已經貢獻了不少天主教通史性著述的情形之下，對於需要結合某地文化、習俗、環境等來作深入研究的個別地方教會歷史研究，還是顯得非常重要。在這一意義上，劉志慶教授這本書的價值自不待言。尤其是作者在研究安陽（衛輝）教區史的過程中，對天主教朝聖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作者有更多有關中國天主教研究的佳作問世。

10 卓新平，〈當代中國基督宗教研究〉，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